

壹、前言

《韓非子》〈顯學〉言「世之顯學，儒、墨也」，又言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陳奇猷，1991：1080）。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在孔子（551-479 BCE）之後儒家思想曾蔚為潮流，且內部的發展似乎相當多元，雖然我們無法從現存的文獻之中明顯知道這些支脈的主張與關懷，裡頭也可能存在著所謂的正統與異端之爭，但這或也恰恰反映了先秦儒學之統所面臨的時代問題與相關的回應方式的確有著明顯的變化。自孔子在春秋晚期確立了先秦儒家人文化哲理化的基本方向，並使得仁與禮成為學說核心之後，分別身處戰國中、晚期的孟子（372-289 BCE）、荀子（336-236 BCE）遙承其緒，更進一步深化了先秦儒學的這兩個主要方向。若用現在的學術話語來說，即向內在道德主體與心性修養的深化，與往外在客觀禮制與政治秩序的追尋。然這樣的深化，其實是孟子、荀子因著時代的挑戰而提出回應時所不得不然的結果，而這也反映在兩人對人性的論述之差異上。

在華人傳統教育哲學之中，荀子向來以其「性惡說」與「禮論」著稱。荀子的性惡說及禮論可以說是掌握荀子學說的兩個關鍵。荀子的「性惡說」建立在對他所理解的孟子「性善說」的批評之上，而其「禮論」則是上承在他之前的禮樂系統，下開《禮記》以降的禮論思想，並在後代發展而成為一套龐大的禮樂教化傳統。若關聯著荀子的禮論而說，則在荀子的理論視野中，因為「禮」，人的「化性起偽」從而為善才有可能。或可說，荀子之性惡論及其「禮教」所隱含的是一套性善說。

以下，本文將首先從先秦儒學的發展與分化過程，並透過對「五行」（特別是出土文獻裡的《馬王堆帛書》〈五行〉篇裡的概念）的討論，凸顯孟子與荀子思想之差異，其次以荀子〈性惡〉與〈禮論〉為核心，旁及諸如他的〈勸學〉、〈修身〉、〈天論〉等相關篇章，述介其人性論及禮

論，藉以揭示其「禮教」與「性善」說。

貳、孟子與荀子學說之差異

試看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對孟子、荀子兩人生平的描述：

孟軻，鴻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瀧川龜太郎，1993：919）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驕衍之術，迂大而闊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瀧川龜太郎，1993：921-922）

我們可以從以上的段落裡讀到的是，相較於孔子所處的春秋晚期，彼時人們仍可推知周禮，對周禮仍有保存（「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且或仍為諸侯遵循著，孟子與荀子所處的時代卻已是富國強兵為尚、合縱連橫之說、陰陽五行之說盛行的戰國晚期。孟子、荀子兩人皆推